

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走向繁荣的历史进程正是为今天创造了历史的机会。正是中国人在20世纪的奋斗和这三十年的发展为今天提供了条件，而新的全球化进程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空间。这三十年中国人为了告别贫困艰辛地劳作，为了改变命运而努力地学习和工作。我们的辛苦和努力在今天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们在自身走向繁荣、改变贫困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纪念改革开放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文化发展史



这个国家的形象，也在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 **张颐武 主编**

我们一同走过的这些岁月其实是弥足珍贵 **上海大学出版社**

的。我们可能身处其中，难以感受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所具有的巨大的意义，也难以充分体验 我们的这些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但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我们的努力的意义会被历史所铭记。中国的“大历史”正在展开自己的新的形态，中国也已经走出了悲情。我们不需要说今天的中国是“盛世”，因为我们会意识到前面的挑战和问题，也因为我们的未来会更加辉煌；我们不需要说今天的我们创造了历史，因为我们知道还有许多矛盾和困难的选择在考验我们，也因为我们知道前方的道路其实更加宽广。今天的奥运会其实说明的是一个 实实在在的道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进步离不开中国。让中国和世界一起前进，让人类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文化发展史

张颐武

张颐武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文化发展史/张颐武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8. 10
(100 部全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重点图书)
ISBN 978-7-81118-290-3

I. 中… II. 张… III. 文化事业—文化史—中国—1978~
2008 IV. G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6125 号

策 划 姚铁军

书名题写 冯骥才

责任编辑 焦贵平

版式设计 柯国富

封面设计 朱静蔚

责任校对 叶道莲

朱琳珺

技术编辑 金 鑫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发展史

张颐武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上海市华业装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9.5 字数 374 000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978-7-81118-290-3/G·484 定价: 48.00 元

目录



1978-2008

2008

目录

1978

1	导 论：三十年“中国梦”的伟大旅程
18	第一章 中国小说三十年发展
55	第二章 三十年中国电影发展
98	第三章 三十年中国戏剧文化
138	第四章 新时期散文三十年
187	第五章 三十年中国诗歌发展
234	第六章 三十年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思潮
280	第七章 中国前卫艺术三十年
327	第八章 中国电视节目三十年
349	副编一：春节联欢晚会三十年
372	副编二：三十年喜剧电影
406	副编三：赵本山现象
423	副编四：王朔和海岩
467	说 明

2008

导论：

三十年“中国梦”的伟大旅程

1978

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确实给了世界一个惊喜。一百年的梦想，中国付出了这么多，今天终于有了历史和世界给予中国的报偿，而中国 and 北京也用自己的想象力挑战创造的极限，以对于完美和圆满的追求回报了整个世界。这个城市里璀璨的焰火和鸟巢里的演出都让世界赞叹。中国给了世界灿烂的视觉的震撼，给了世界传统文化的神韵和气势，给了世界对于人类价值的共同的关怀。

开幕式有两个亮点其实象征了我们所走过的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道路，值得稍加分析：

一个是它所展示的主题歌，一个是点燃火炬的人。这两者都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

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的主题歌《我和你》，歌词非常短，但其实词短情长，意义很深：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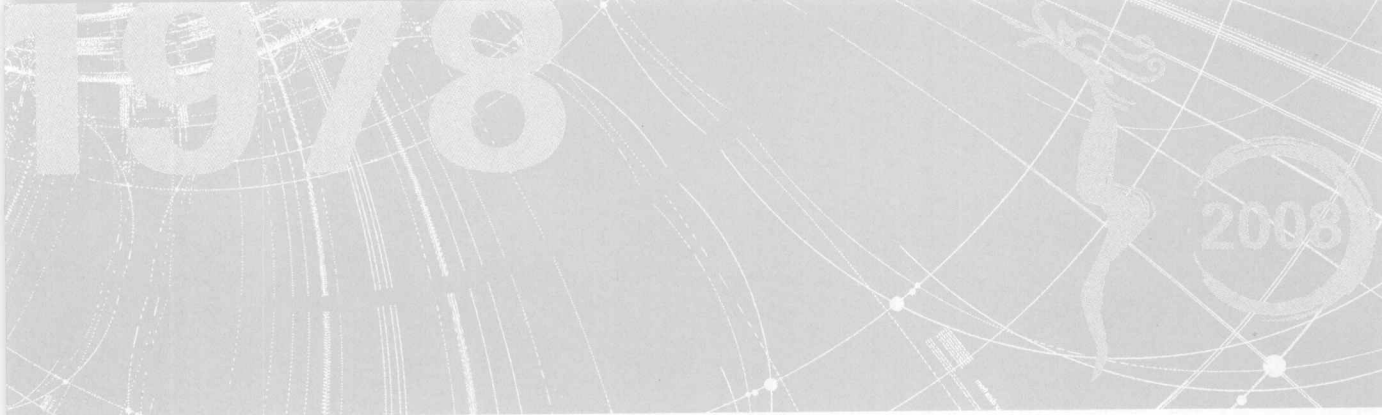
这里的“我”和“你”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这里，我和你之间已经有了一种比肩淡定的从容和平和，有了一种相互守望、共同创造世界未来的自信。我们“同住地球村”的意识，“永远一家人”的愿望，都喻示着在这个2008，在这次的奥运会上，中国和世界之间新的关系。这里所显示的是一个民族的坦然和坦诚，也显示了中国已经融入

世界。这种融入当然不是取消“我”和“你”之间的差异，而是我们在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中展现的新的理想和新的祈愿。中国此时已经能够平视世界，已经能够在为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分享人类共同的价值和理想。

1993年，一首也同样由刘欢演唱的歌曲，有和这首歌相似的题材，内容却有完全不同的面貌。那首歌同样表现的是“我”与“你”的关系，也同样意蕴深沉，但却和《我和你》的意思有相当的不同。这就是1993年的秋天播出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歌《千万次的问》。虽然那部电视剧仅仅是讲述一个北京人王起明在纽约的艰难的奋斗史，但主题歌却超越了这部电视剧而具有着相当的意义。那首歌也同样震撼人心：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问我到底爱不爱你，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我今生看来注定要独行，热情已被你耗尽，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问我到底恨不恨你，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好在那里。”

《千万次的问》曾经感动过许许多多的人。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在表现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它所反映的是当时中国人的认识水准。在这里，“我”还是在做着坚韧的努力，试图融入世界，和“你”平等对话，但这一切却显得如此艰难和如此痛苦。中国还在艰苦地摸索着走向世界的道路，我们还充满着一种对于世界的焦虑。中国和世界之间还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中国人百年的富强之梦，其实就是试图让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融入世界。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落后就要挨打”的痛苦的经验，让中国面对世界的时候，难免于仰视和俯视的视角，两者都充满了焦虑。这就造成了《千万次的问》里面的那种爱恨交加的复杂的情感。“千万里”的追寻，而“你却并不在意”的感慨，“我已经不再是我”的必然，而“你却依然是你”的现实状况，让这首歌自有自己深沉的内涵。20世纪中国人的艰辛的奋斗其实正是为了争取一个和世界之间的新的关系。中国人



走向世界的梦想，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人类贡献中国的力量的愿望，正是我们在整个 20 世纪不断努力追寻的目标。《千万次的问》其实也非常有力地表现了我们曾经有过的悲情，我们曾经有过的感慨，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的艰难。

但今天，我看到的是在一个蓝色的星球之巅，刘欢和莎拉·布莱曼一起引吭高歌：“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我们所付出的一切获得了历史和世界的报偿，“我”和“你”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在一起”的美好的时刻。我向你伸出的手也得到了你最好的回应。《我和你》短短的歌词其实道出了我们内心的感动和浪漫的情怀。

点燃主火炬的李宁是让中国骄傲的运动员，他又是一个成功转型、在创业的路上获得了成功的企业家，他的精神和生活正是说明了“中国梦”的丰富的内涵，正是中国年轻人的一个完整的榜样，他在这个晚上达到的高度和他的再度挑战极限的勇气和能力让我们感受中国人的力量。如果说，李宁的前半段的成功体操生涯让我们受到精神上的激励和振奋，那么，他的后半段成功的企业家的生涯也让我们感受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发展的主题也仍然是今天中国走向未来的宝贵动力。我觉得李宁其实完美地呈现了“中国梦”的形象，也完美地呈现了中国人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提升的能力。李宁的历史可以说是所有中国人共同走过的三十年历史的一个象征。在这个创造历史的新的起点上，李宁是让圣火点燃的人，也是让我们感受三十年来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之路的人。

他在 1984 年的洛杉矶让所有中国人感受过中国的青春的力量和中国最初走向世界的开放情怀，他在 1988 年的汉城也体验过挫折的痛苦。他从鞍马上跌落的镜头让我们感慨，也让我这个当年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感到惆怅。从此我一直关心着这个我的同代人的发展，关心着一个叫做“李宁”的品牌的成长。但在二十年之后，李宁再度来到了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在北京的鸟巢里看着他在空中大步向前，他飞翔

得比当年更高了。我不会注意他和画轴同步得是否天衣无缝,但我所看到的是他超越自我、敢于挑战的雄心壮志,看到的是他背后的中国正在大步流星地和世界一起向前。他燃烧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内心的火炬,而且是人类共同的祈愿和希望的火炬。同时,他点燃火炬的同时,也把责任交给了今天的年轻人。李宁点燃火炬,完成了他的使命,也让我们的年轻人感受到他们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我在这里看到了薪火相传的生命意涵。

这两个“点”见证了三十年来我们从封闭走向开放,从20世纪的文化悲情走向从容平和地面对世界的心态的变化。

三十年来,我们可以说走过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到90年代的“后新时期”直到今天的“新世纪”。这可以说是打造新的“中国梦”的伟大的旅程。

80年代的中国刚刚从“文革”中脱离出来,正处在一个精神解放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把一切都视为精神解放的表征,一条牛仔裤,一副“蛤蟆镜”都意味着从精神上摆脱压抑,追求新的空间的努力。其实80年代的主题,就是如何将个人从计划经济时代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80年代的“主体性”的召唤表达出来就是这种“个人”存在的精神性的要求。无论是萨特还是弗洛伊德其实都是为这个新的“个人”的出现发出的召唤。这个“主体性”的个人的展开,直接提供了思想和精神从原有的秩序中“解放”的想象。其实,80年代文化的关键正是在于一种对于康德的“主体性”观念的新的展开。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的1984年版有一个异常重要的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80年代思想的核心命题。李泽厚在这篇文



章中点明：康德的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①。而李泽厚的发挥似乎更加重要：“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②这里李泽厚召唤的康德的幽灵其实是对于 80 年代新的精神的召唤。“主体性”正是整个 80 年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话语中脱离的基础。而这个“主体性”正是新的“现代性”的展开的前提。80 年代其实具体地展现了这一“主体性”的话语。正是这种“主体性”的寻找，变成了 80 年代的“现代性”赋予我们的最大的梦想。当时的“新时期文学”主导着各种大众文化的复兴。当时中国人从匮乏中挣脱的时候，首先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个人的确立。

我们可以把这种“共识”称之为“新时期共识”。这一共识起源于 1978 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新的国家结构，也出现了与这个新国家结构密切相关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当时的中国一方面期望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则希望向西方敞开大门，走向世界，进行“开放”。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共同的反“左”，对于五四以来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反思之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他们以批判传统计划经济的局限为中心，在“知识”领域中完成了新国家结构的意识形态工程。他们建构了两个方向的“共识”，而这种“新时期共识”也一度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首先，经历了“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计划经济现代化的挫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引入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经验，以达到经济成长和发展有一致的“共识”。这可以称为“发展共识”。

^① 《批判哲学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24 页。

^② 同上，第 43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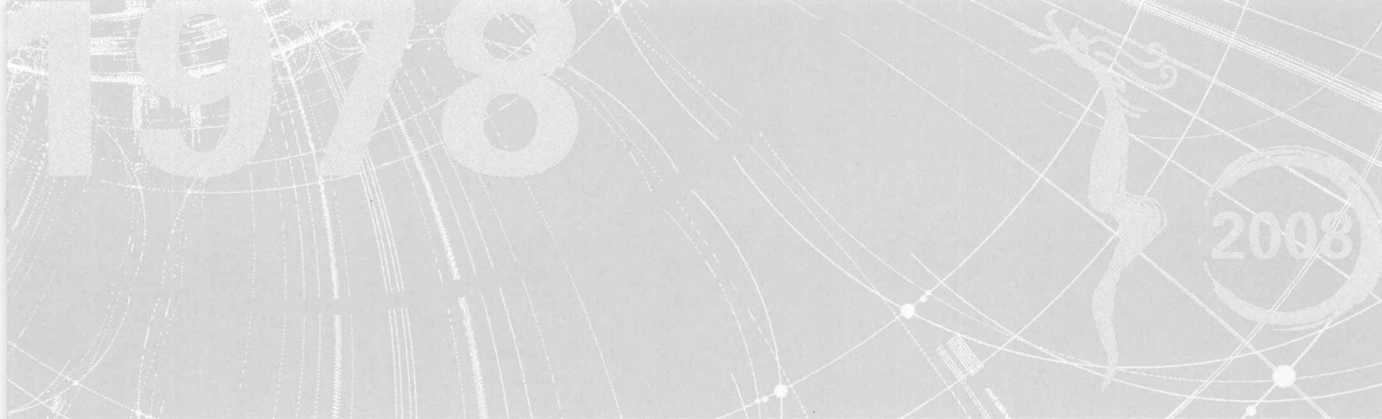
多数知识分子认为,经济发展乃是社会进步的中心标志。李泽厚就提出:“现代化又确乎是西方先开始的,现代大工业生产,蒸汽机、电器、化工、计算机……以及生产它们的各种科技工艺、经营管理制度等等,不都是西方来的吗?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①作为现代化的西方化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这一“发展共识”的中心。第二,这里形成了一个“个人共识”。这个“共识”乃是基于对于五四以来中国历史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描述。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以救亡为中心的“现代性”话语导致了“文革”的悲剧。而在“新时期”,个人主体的发展,个人解放应该成为文化的中心。李泽厚对此有非常简略的描述:“‘五四’运动是两个运动而不是一个运动。这两方面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启蒙是反封建,救亡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的危亡局势和越来越激烈的现实斗争,改变了启蒙与救亡相平行的局面,政治救亡的主题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所以,‘五四’的启蒙工作上没有做。建国后也忽视了启蒙方面的问题,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紧接着就号称进入了社会主义,实际上,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没有受到过市场经济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击,封建主义仍然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和无意识的深层。”“我认为,反封建仍然是现在的主题。”^②这里,中国的计划经济历史往往被阐释为封建主义对于个人的压抑。而再度启蒙则意味着对于个人主体的热切肯定,而对于“民族国家”的价值则相当忽视。也就是在启蒙/救亡的二元对立中强调启蒙的关键性。

“新时期共识”就是以“发展共识”和“个人共识”构成的一套话语,它所坚持的是现

① 《漫说“西体中用”》,《李泽厚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9 月第 1 版,第 353 页。

② 《走自己的路》,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1990 年 8 月初版,第 288 页。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第 1 版,第 344 页。



代性的普遍性，是以在欧美发展的现代性作为它的标准模式。这种对于“普遍性”的追求成为这一共识的关键。它成为“新时期”文化和“知识”的基础，也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的相对一致的前提，他们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而新的国家结构则为他们提供了舞台，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中心。“新时期共识”的存在提供了一种一致的“现代性”想象的策略。

进入 90 年代，世界和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时期”追求的目标仿佛就要实现，但它本身又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历史根本没有按照预想的道路前行。在“冷战后”的新的世界格局和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的状况成为世界的焦点。中国的 90 年代的文化经验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后新时期”中，中国经历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是极其深刻的，它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导致了高速的经济成长，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新问题。中国以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在 90 年代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一方面是社会的象征系统维持不变，以作为社会避免急剧变化过程中的混乱的策略，随着苏联、东欧雪崩式瓦解和十年来俄罗斯的持续危机以及国际竞争的激化，民众的国家认同也有所凝聚；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对于社会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已经极大削弱，国家直接控制的工业资源已经不到 30%，传统的“单位”体制已经越来越弱化，跨国企业和民间资本已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舞台。而在越来越市场化的社会舆论和大众文化的主导下的所谓“公共空间”也已经迅速形成。人们的生活经验已经不可能处于国家的全面控制中，这种全面控制的基础早已瓦解，而是明显地处于一种横向的联系之中，市民社会已经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开始形成，而随着大量移民的出现及互联网的发展和国际投资的剧烈增长，中国的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目前，中国在全球化之中无疑早已不再是一个国家全能的社会，而是一个社会的“横”向的

关系和国家的政治象征及“纵”向管理交错的复杂的社会。90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化的特点就在于一种“物质性”的出现。没有物质性的变化,我们就不可能有新的未来。虽然我们可能丢失80年代宝贵的东西,但这丢失却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必然。80年代的文化中我们的想象是建立在精神的基础上的,我们好像是用头脑站立在世界上,我们虽然仍然面对匮乏的生活和新的来自外界的物质性的诱惑,但我们的纯粹的精神追求和抽象的理想支撑了我们的想象和追问。所以,80年代的“新时期”虽然有极大的物质性吸引的背景,却是在精神的层面上展开的,它依然是不及物的。这里的追求几乎忽略了“物质”的诱惑和吸引。但90年代的“后新时期”却是将80年代的抽象的精神转变为物质的追求。消费的诱惑的力量使得当年抽象的“主体性”今天在现实的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面临新的变化。这是将康德的玄虚的用头脑站立的状态,转变为用双腿支撑自己的“主体性”。其实,80年代和90年代在断裂中自有其连续性。90年代将80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80年代的“主体”是以抽象的精神进入世界的,它仅仅表达了一个真诚而单纯的愿望,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展开。它的没有物质支撑的空洞性,正需要90年代的填充。而90年代的这些中国的“个人”以实实在在的劳动力加入了世界,用自己的具体的劳动和低廉的收入寻找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世界。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正是20世纪的90年代给了抽象的80年代一个具体的、感性的现实。80年代的那些抽象而浪漫的观念正是被90年代的消费愿望和物质追求所具体化的。

90年代的“后新时期”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新时期共识”面临着挑战,从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到有关“后现代”、“后殖民”的讨论都涉及了对于“新时期共识”的反思。它的有效性已经受到了质疑,知识分子一方面已经开始“边缘化”,不再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心,而开始出现了大众文化主导的新的结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内部也开始出现一



系列根本的分歧，这些分歧正在扩展。80年代后期，王朔的崛起开始于文学领域，以一种“顽主”的姿态在内部对于“新文学”秩序进行某种否定，但仍然是“新文学”话语内部的人物。但进入“后新时期”，王朔的活动显然超越了“新文学”的话语的限度，以一种以“消费”为中心的大众文化向“新文学”话语进行否定的高调姿态出现。从《渴望》的流行到《编辑部的故事》的轰动效应，直到90年代中期之后的最早期的冯小刚的“贺岁片”，王朔在大众文化中的影响是90年代的一个传奇。他将“消费”合法化，使大众与精英对立的合法化的行为成为90年代知识分子内部分裂，“新时期共识”破裂的导火索。对于王朔的评价问题成为知识分子的不同文化倾向的争议的关键之点。王蒙的《躲避崇高》一文中有关王朔评价引起的分歧变成了“新文学”话语受到冲击的标志。

90年代的两场重要的讨论，也就是“人文精神”的讨论和“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是将对于中国在“后新时期”发生的历史变化的意义的分歧摆上了台面。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消费”和日常生活的超越启蒙话语的变化。这里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90年代的消费性的潮流；二是如何理解大众文化的崛起。其实当时争论的双方实际上都超越了“新时期”的“发展共识”和“个人共识”，也开始超越“现代性”的宏伟的叙事。一部分知识分子强调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和“消费”时代给中国带来了异常巨大的危机，他们要进行一场“抵抗投降”的崇高的圣战以捍卫“新文学”话语的神圣性。他们决心对抗性地面对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的社会后果，认为这种消费的浪潮和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浪潮会导致危险。他们试图在中国语境中彰显自身的对抗性的形象。他们对于消费文化和中国的日常生活的改变抱有悲观的态度。在这里他们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超越了“发展共识”，认为经济的发展和负面效果会导致人的“堕落”。这并不是五四“新文学”的思路，而是在捍卫“新文学”的旗帜下的一种背离和偏移。他们对于“个人共识”的激情肯定其实也导向了一种对于“个人”的理解的偏执。另

1978

2008

一种知识分子则试图理解新的时代。在对于批评理论和中国文化现实的阐释中对于“消费”和中国的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作了相对平和的分析。在理解消费和中国人改善生活的愿望的同时也试图进一步阐释文学的“边缘化”问题和大众文化的崛起。这种思路也力图超越“现代性”话语的局限,在对于“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理论阐发中找到新的文化图景的描述。

其实,在今天看来,90年代的我们过于简单地理解了消费文化,认为它只有负面的作用。当时似乎认为,消费话语和新的大众文化的出现仅仅是“放弃”甚至是“背离”了五四“新文学”的理想,因此无法满足中国人的梦想中的期望。批判和否定者认为消费和大众文化是完全消极的,而这种文化的认知和阐释者也认为它乃是一种历史的潮流,而将理解放在了它的必然性和它对于人们的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的实现等方面的阐释中。实际上从今天的态势来看,消费和大众文化对于中国具有更积极的含义: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了多元的选择,为他们的人生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另一方面,消费欲望的激发为中国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大众文化的活力也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实际上历史的某种吊诡之处在于,“新文学”话语追求的民族崛起的“强国”梦想却意外地在一种极为世俗和平凡的消费与大众文化的语境中实现了。革命、斗争和痛苦所准备的历史条件,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化的以消费和大众文化为中心的语境中才整合为新的未来的中国所需要的前景的。正是依靠90年代“后新时期”的世俗的文化语境,中国展现了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历史机遇和无限的可能性。

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世纪文化”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和平崛起伴随着加入WTO、申奥和申博的成功而已经变成了现实。有关中国的“脱贫困”的形象已经凸现出来。“新世纪文化”已经从各个方面全面超越了“新文学”的话语构架和文



学制度。这种转变可以用《新周刊》2003年10月1日那一期的表述来形容。这一期《新周刊》的主题是“新新中国”。编辑有这样一个表述让我有所触动：“对于‘中国’来说，‘新中国’这个词语一直表明着政治上的新，政体的更新；如今在生活方式、文化时尚形态上有着全新的方向与发展可能，‘新新中国’冒升而出。”对“新新中国”的描述的确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中国的历史发生的改变可以说在日常生活层面和全球层面上都前所未有的。90年代以来全球和中国的一系列变化到新世纪已经由朦胧而日渐清晰。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和资本投入的中心的崛起是和新的世界秩序的日益成形几乎是同步的过程。中国开始告别现代以来的“弱者”形象，逐渐成为强者中的一员。新的秩序目前并没有使中国面临灾难和痛苦，而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机遇。中国内部当然还有许多问题，外部也还有许多挑战，但伴随着新世纪，中国的发展进程已经完全进入了实现的阶段：首先，中国的告别贫困，以高速的成长“脱贫困化”正是今天中国的全球形象的焦点。其次，中国开始在全球发挥的历史作用已经能够和全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划开界限。这个进程正在改变整个世界。而这种改变强烈地需要新的文化想象。这个被《新周刊》称为“新新中国”的新的前景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

当下的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中国的许多问题、希望和困扰已经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换，我们的旧的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到了一个新的框架之中，就像工业社会的来临没有取消农业，而是将它放入了新的历史框架之中一样，中国今天发生的剧烈的变化正是一个历史的替代的过程，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新新中国”正在迅速地超越原有的中国“现代性”的宏伟的历史框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历史角色。

这一发展的核心恰恰是中国的全球化的进程打破了原有的“内”、“外”的界限和中国固有的失败和屈辱的历史角色，中国开始从自己的近现代历史的规定性中解放，获得

了新的空间的定位,这一定位可能还并不完全清晰,对于它的评价也还有不同的视角。但变化带来的新的中国的全球性的形象则是没有疑问的。同时,中国内部的市场化也为这一变化准备了历史条件。中国的巨大的劳动力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他们开始在一个新兴市场中追逐梦想,寻找新的可能的机会改变由于过去的匮乏带来的巨大的压力。而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给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机会。于是中国崛起于世界的历程伴随着冷战的终结开始了。实际上,中国历史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发展正是中国内部的变化和世界的变化的不可思议的同步的结果。在中国内部出现的跨出原有的匮乏和压抑的时代的强烈要求,正好和一个正在到来的全球性的信息时代以及由于交易成本下降而产生的大量的剩余资本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接合。中国人民的消费渴望通过劳作获得更多收入的热情和资本共舞带来的结果让世界和中国共同改变。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其实对于历史的这一走向并无明确的意识,当时我们还曾经以南斯拉夫的经验作为中国发展的榜样,也曾经以回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作为一种诉求,“新时期”的历史也曾经展开过不同选择的可能,但从今天回首望去,南斯拉夫已经消逝,“十七年”也在历史的另一侧的遥远之处了。中国历史其实由于全球空间的变化而展现的活力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的最佳的表征。这里的“大历史”的变化可以说是出现了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的结果。这里出现的中国的“脱贫困”的进程可以说是新世纪中国的新的不可遏制的趋向。中国已经展示的新的形态无疑已经超越了现代性历史的限定,展开了新的篇章。

这里的新的历史对于过去历史的超越其实是空间的支配作用的后果。我们原来在一种黑格尔式的“世界史”的立场中,预设了历史的目标和实现的途径,这也就是五四的“新文学”所赋予我们的宏大的历史意识。我们认定我们自己在统一的世界史中的落后,我们试图通过几代人的艰难的集体的奋斗和对于世界秩序的反抗而获得一种中